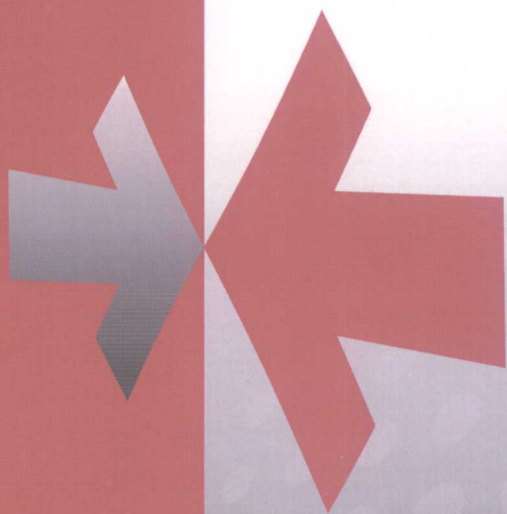


XINXI YU CHUANBO YANJIU FENYE YU JIAORONG



信息与 传播：

研究分野与交融

知识产权出版社

张 锦◎著

信息与传播： 研究分野与交融

张 锦 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内容提要

以信息(或情报)为基本范畴的信息科学或情报学及其相关学科如图书馆学、档案学,与以传播(或交流)为基本范畴的传播学,都是基于“人类信息传播”的学科。本书全面概述和评价了国内外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现状,追溯这些学科的历史渊源、内在学理联系,并对其融合提出了想法,目的在于推动整个领域不分彼此地取长补短。本书虽是严肃的学术著作,但语言风格活泼,故事性强,可读性强。适合对信息与传播研究领域感兴趣的较高层次读者。

责任编辑:石红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信息与传播:研究分野与交融/张锦著.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10

ISBN 978-7-80198-769-3

I. 信… II. 张… III. 信息学—传播学 IV. G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60955 号

信息与传播:研究分野与交融

张 锦 著

出版发行: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1号

邮 编:100088

网 址:<http://www.cnipr.cn>

邮 箱:bjb@cnipr.com

电 话:010-82000893 2000860 转 8101

传 真:010-82000860-8325

印 刷:知识产权出版社电子制印中心

经 销: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9

版 次:2008年1月第一版

印 次:2008年1月第一次印刷

字 数:217千字

定 价:28.00元

ISBN 978-7-80198-769-3/G·499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前 言

就在我准备这部书稿而遍阅群书的时候，偶尔看到了李敬一先生写的《中国传播史》（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令我感兴趣的是作者在书中将史官记事作为中国早期专业新闻传播活动来加以论述，认为古代史官是最早的专业新闻传播者之一——只不过不是大众传播，而他们身上体现的良史精神也是中国古代新闻职业道德的表现。我所以感到有趣，是因为当时我刚完成一篇档案学论文，将古代史官当作古代的档案工作者——这在档案学也不是很末流的观点——在本书中也有所涉及。而与此同时，我的一位历史学出身的同事则大义凛然地认定史官理所当然是古代的历史学家，是记载历史的官员。

我认为古代史官是档案工作者是与我的记录档案观相吻合的，即档案工作者的实质是系统地、有目的地对历史进行具有原始凭证性的制度化记录活动，正如我们今天仍然可以看到的那些所谓有意识的档案生成活动，如人事档案等。而古代的史官就是在没有今天的摄像技术条件下用笔来进行原始记录的国家官员。“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或者相反，其目的都是为了保存与查考，也可以说是早期的监察官员。所以有人说无论是“赵盾弑其君”还是“崔杼弑其君”，其实都没有很多人误认为的那样高尚，一句“弑其君”就表明了赵盾和崔杼的君并不是史官的君，史官的君是周天子，他们是被周王室派遣到诸侯国

进行监督的官员，他们的记录需要保存于周，所以也算是情报官员。即便是周王室，史官也不仅仅是记事，更重要的是掌管图籍，即档案与文书。官员的设立：“大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史通·史官建置》）。他们的工作都是记录。

不过我并不认为我是在反驳李敬一先生与我的同事，我想照他们的读解又何尝不可呢？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理解是一面镜子，看见的是自己。他们的说法，至少表明了本书中所要表达的历史、档案、情报、新闻之间的特殊关系。在李先生的书中也很显著地论述了图书传播——传统上也是图书馆学与文献学的领域。这可以让我们体会到这些信息与传播的领域原本是不可能分得太清的。

其实我早就有出版这本书的计划。在我离开人民大学后这么多年，事实上我也与学术界相对隔绝了多年，这期间，情报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固然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关注（包括一直为此不懈努力令我敬佩的北京大学的周庆山教授），但总体上却没有实质意义的进步，这大概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情报学和传播学都是舶来品，相关学者对两者及两者之间关系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更何况，在现在的图书馆、情报甚至档案领域里，信息资源管理观的盛行令我感到不安，在我看来，这种倾向在很多方面相对于交流观来说是一大退步。这是促使我出版本书的根本目的。

本书出版的更直接的目的，是关于我的一个受国家留学基金资助的研究课题——“基于解释学循环的面向业务流程的计算机知识管理系统”的应用。当时我企图将解释学原理应用到网络环境中的最终基于语用层次的信息系统构建上，这本是我最初的学位论文选题，但后来时间紧迫加之缺乏良好的范例而改写了这本书的原型。更没有想到的是我离开人大之后始料未及的长期颠沛流离的生活，原有的那些构想也一步步被他人的

实践所蚕食，如弗朗霍夫知识管理模型、Agent 技术等。如今这个梦想对我而言虽是水中月，但也还是希望对本领域研究有所推动。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有很多的基础理论问题没有得到详细论述，因为这个设计思想需要应用到本书涉及的几乎所有学科并融为一体，特别是欧洲传播研究与文化研究。

因而，很明显，本书实际上仍是一个未完成项目。因为可以看到我的论述还是集中在美国传播学，更准确地说是施拉姆传统。因为我实在没有太多时间和精力去“不务正业”，本书的内容大体上不属于我的本职工作，生存现在对我而言是第一要义。我把这项工作放在了以后，我希望将来能有足够的时间。不过，我反过来也认为，这样压缩了我的论述领域，也许是一件好事。当然，我还是希望传播领域的读者仍然可以通过本书换一种角度思考。

结构上的改动痕迹还是在本书中可以找得到。原来设计的结构是三部曲：信息与传播的关系；互联网络“第四媒体”的迷思（很时髦的词啊）；解释学与批判理论在信息系统构建上的应用。其逻辑是先综述，然后是传播学的话语结构如何导致人们的盲点，然而情报学不要高兴太早，因为这种话语结构在信息系统设计中更加明显，人们忽视了人的信息传播的社会大背景。最后一部分其实才是我写本书最直接的目的，但我还是不得不刹住，将部分内容融入到了前面的章节之中，三步变成了一步。最后的结构不像严谨的教科书式的系统模式，因为我宁愿写成一部电影剧本。如果读者有这种感觉，就是我的目的达到了。如果读者对整个学科群有一点混沌的感觉，那也是我的目的达到了。

对于第二部分，其实是我由来已久的一种理念，其核心正是我所提到的“信息空间”。而且有趣得很，这一想法的最早萌生是我在 1990 年初作为一个缩微摄影工作者回到本科母校参加

缩微年会，当时我第一次亲眼见识到类似于麦麦克斯系统的一个电子计算机与缩微卷片终端的联机检索系统。这是我的老师刘元奎教授领导下的一个项目。信息空间！醍醐灌顶，我几乎一下子就有了我在书中论述过的那些先驱们如奥特莱、布什等人的构想，并为此而进行了多年的不懈努力与探索。即使现在我在写到万尼瓦尔·布什的时候眼前晃动的还总是刘元奎教授清瘦的面孔（还别说，他们真有几分别相似）。因而，多年后当互联网被称为“第四媒体”的时候我哑然失笑。在原来的结构中，我本来设计了两幅漫画来表现这种荒谬：一是一位老太太在架搓衣板于其中的洗衣机边挥汗如雨，二是一位老把式坐在奔驰小轿车顶上扬鞭催马，他们似乎都实现现代化了——当然我记得后一种构思有剽窃之嫌。

正如我前面说的，情报学不要过早高兴，因为这两幅漫画最早是我在1999年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会上准备拿来说明网络信息系统如何用老思维来开发新事物的。正如单机版的索引系统不应当是将印刷版的索引用文字处理软件录入成字处理文档一样，网络信息系统也不可能仅仅建立在简单利用网络的快速传输与庞大存储空间上，或者仅仅是单机的简单互联通信的基础之上，因为它是将社会的交流系统搬到了网络虚拟空间，而且这种系统是人的，是意义的，是思想的交流系统。这样一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传播学和情报学的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解决的关键还是引入更广泛的社会背景和人文传播研究。

对传播进行研究，其实对我来说也是很早就萌生的兴趣。我在书中提到，拉扎斯菲尔德和卢因等人对传播问题的关注，是有灵魂的追求在其中的，我也一样。我在本科学习阶段深受刚从美国回来的张晓林老师的影响，这种对我思维方式的影响至今不变，也让我从此产生对英美教育的景仰。这位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博士也许是我在本书中论述的科学理性主义范式的代

表——当然这只是我的主观感觉。在设计一个受控的机器系统时，的确所向披靡。但我很快发现当情报学同样要处理的社会信息交流系统时，却遇到了充满谎言与欺骗的人的交流，情报学似乎很难处理这一点，至少对于内部系统而言。更进一步，我发现我一直坚信的社会舆论与所谓民意并不一致，它们至少是处在不同层次上的事物。这个时候我读到了沙莲香的《传播学——以人为主体的图像世界之谜》。这也许说明了我对传播学的关注在灵魂深处是文化传播这一部分。不过，张晓林的影响使我既关注解释学——所谓极端人文倾向的象征，又关注计算机应用——极端科学倾向的象征，以至于金元浦教授——我的解释学老师对我的构想既觉有趣，又觉不易。正如我在书中提到，情报学范式的人文转移并不是对系统范式的简单否定，而是继承和发展。

我在本书中将焦点放在了美国传播学方面，至少这一部分与情报学有更多的共同点。但从2000年开始几乎完全沉浸在文化研究与英国媒介研究多年之后，我甚至已经不再认同施拉姆传播学是传播研究的主流这一流行说法。这也许有点屁股决定脑袋的偏颇。但起码我为我在2000年前准备与文艺理论更相关的文化传播博士考试时却更多进修施拉姆新闻传播课程的愚蠢往事而感到羞愧，尽管这种机缘让我有了更广阔的视野。在有限的写作时间中我很难将两个时期认识的差异抹去。这种难以弥合的认识差异应该还有很多。这也许是本书的一大遗憾，但也是一种档案，代表了一种历史存在，因为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事情。

这本书主要是讲情报学和传播学，但相关的图书馆学与档案学也大量涉及，而在我的眼中，档案学是比图书馆学更靠近情报学的学科。这不仅表现在我在本书中稍有涉及的理论层面，也与大众想像相符合。当我在图书馆学系学习情报学的时候，我的朋友们感到难以理解；当我在档案学院学习情报学的时候，我的朋友们觉得理所当然。然而尽管我力图尽可能多地增加档

案学的成分，但图书馆学与情报学的历史渊源却是现实，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尽管我并不认为理当如此，这不仅仅是因为我的第一硕士专业是档案学。搁置欧洲传播研究是本书难以融入更多档案学内容的另一个原因。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的很多老师、朋友和老同学，无论是本科的图情系，还是第一硕士的档案学院，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特别是我的本科辅导员，现在的良师益友史光辉老师，以及第一硕士导师马文峰老师。我在此表示感谢。当然还有前面提到的那些包括当年新闻传播学院、中文系、社会学系的老师们，如郑兴东、喻国明、郑也夫等。在书中涉及的电影方面的内容也要感谢我的第二硕士导师郑洞天老师。此外，我的英国导师乔恩·德维（Jon Dovey）在本书写作过程中以及写作之前的英国时期都给了我大量的直接的帮助；而其他老师及英美的同学们也继续给我各种帮助，甚至包括一些英文人名读音的核实。本书的专有名词采取了情报学传统的外文直书与传播学传统的中译相结合的方式。本书中提到的卡琳·瓦尔—乔金森（Karin Wahl-Jorgensen）博士与我在英国时几乎隔江相望，但还是没能见上一面，以至后来网上相见恨晚，她对本书保持高度关注并给予了最大限度的帮助。当年我仅仅是猜想的东西被她所证实，我采用了她提供的大量材料。

最后，尽管我这里已经搞得像奥斯卡颁奖典礼了，但还是要感谢我的父母和家人。

张 锦

2007年8月于北京仙第居（SHANTY）

C 目 录

Contents

引言	1
第一章 理论的引进与交流	4
第一节 背景概述	4
第二节 学科比较研究	5
第三节 传播学理论利用	16
第四节 交叉研究	22
第二章 传播学孕育与图书馆学、档案学的历史渊源	27
第一节 传播学：世纪中叶的突进	27
第二节 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美国传播研究的源泉	33
第三节 图书馆学芝加哥学派：作为科学的图书馆学	38
第四节 图书馆学芝加哥学派（含档案学）的 传播研究	43
第五节 电影研究：传播、芝加哥学派与电影图书馆	49
第六节 纪录电影与电影档案	54
第七节 档案来源原则的确定与社会记忆功能的初现	60
第八节 道格拉斯·维普尔斯：被遗忘的传播学 奠基人	64
第九节 芝加哥大学传播委员会：最早的传播学课程	75

第十节 伯纳德·贝雷尔森：传播学的逃兵	85
第三章 情报学：与传播学的同步孕育与诞生	97
第一节 同步孕育的双生子	97
第二节 情报学前史中文献范畴的传播研究意义	100
第三节 布瑞特“作为文献的羚羊”与纪录电影	106
第四节 信息处理范式的形成	119
第五节 情报科学的战争催生与接生婆布什	131
第六节 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杰西·郝克·谢拉	144
第四章 基本概念、学科范围与研究角度	158
第一节 关于传播研究前途的 1959 年论战	158
第二节 传播学：模糊的学科范围	168
第三节 情报学：模糊的学科范围	175
第四节 情报与新闻	182
第五节 纪录档案观：作为传播主体的档案工作	189
第六节 话语结构：作为传播主体的图书馆	199
第五章 走向交融	208
第一节 传播学的两种走向及其情报化	208
第二节 情报学的人文主义走向	214
第三节 互联网络：情报产业与传播产业的熔炉	220
第六章 理论融合初步	229
第一节 背景	229
第二节 融合引进实践的研究	230
第三节 研究实践的融合	233
第四节 理论融合的实践	235
尾声	240
主要参考文献	243

引言

1992年后的中国进入了一个多变的时期，这其中包括高等教育院系改名与合并的风潮。这一基本上自下而上的变革热潮可算是共和国历史上第二次“院系调整”了。1999年4月，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与国内四强之一的武汉大学新闻学院合并，组成大众传播与知识信息管理学院，后进一步定名为信息与传播学院，分设新闻学（含广播电视新闻专业）、广告与出版（含广告学、编辑出版学专业）、图书档案学（含图书馆学、档案学专业）、信息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四个系，7个本科专业，5个硕士点（新闻学、传播学、档案学、图书馆学、情报学）及2个博士点^[1]。

这一事件本不应该引起太大的关注，因为此前几年我国图书馆学及情报学领域的改名合并早已不是新闻。如，1992年，国家科委以“信息”替代“情报”。同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系率先改名为信息管理系，随后全国各高校的图书馆学情报学系纷纷跟进，或者叫信息管理系，或者叫信息资源管理系，学科教学内容也有了相应的调整，计算机科学、经济学以及管理科学的课程大量渗入教学计划，院系设置上也分别向上述学科靠拢，如靠计算机学院的中山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归入工商管理学院的南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归入管理学院的湘潭大学以及先靠计算机学院后入公共管理学院的四川大学。在这一过

程中，我国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庞大，也是我国唯一一所图书情报学院的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却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反倒成了新闻^[2]。然而，在新世纪的敲门声中，这一最后的阵地也悄然易帜，并在国内少有地与传播学联系上了。

然而这一联姻很快又分开了。2000年12月新闻与传播学院成立，归属人文科学部^①；2001年信息管理学院成立，归属社会科学部。按照2004年武汉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罗以澄教授的说法：“由于武大图书情报学科非常强，全国名列前茅，新闻传播学科在学院中没有取得主流话语权，加之学院工作千头万绪，很难把两个学科都抓紧、抓好。因此，学校领导又在2000年恢复新闻传播学科独立建院，从而使两个学科比翼齐飞，都获得了飞跃发展。”^②两个巨无霸的最终分离即便在当时也在很多人的预料之中，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合并双方在国内各自领域的独特地位。此后，图书情报学基本上稳定在了以信息管理或信息资源管理命名的院系^③，整合了图书馆学、情报学和档案学以及分散在各学科的信息管理如经济信息管理等学科与领域。图情档的整合趋势在世界范围都是很明显的，也获得了大量的理论支持，这种整合的基础在于信息研究（information studies）。

不过，分离还留了一个尾巴：在合并中“从文学院调入编辑专业，与原出版发行专业合并成”^④的编辑出版专业仍然留

① 人文科学这一说法本身不太规范，应为人文学科，如果成为科学，就不再属于人文领域。同时，无论将传播学列入人文还是科学，对传播学学科范围本身都是存在问题的。本书后面将论及这一点。

② 邱沛篁. 论我国高等新闻教育发展“三要素”[J]. 新闻界, 2005 (1).

③ 伴随着这一改名风潮的是学术界为此发生的激烈争论，特别是“情报”、“信息”之争。

④ 詹德优. 论我国图书情报学教育的进展 [J]. 图书馆论坛, 2000 (1).

在信息管理学院。不管是编辑出版还是出版发行，传统上更应归入传播产业范围。也是在2000年，图书情报学教育的另一个重要机构——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学系改建为信息传播与管理学院。更有意思的是，2004年这个学院与该校渊源于电化教育系的广播电视学院合并组建传媒科学学院。学院设有教育技术学、广播电视编导（内设播音主持方向）、广播电视新闻学、图书馆学、广告学5个本科专业；教育技术学、图书馆学、情报学、广播电视艺术学、新闻学5个硕士点。^[5]

而在国际上那些情报学与传播学合并的院系大多仍保持稳定，包括最突出的美国新泽西州立大学——拉特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而且正如前述，世间之事，分分合合，背后的原因非常复杂，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拉特格斯大学瓦尔利兹（Jana Varlejs）教授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是传播，而不是教育、计算机、公共管理或别的领域？”^①詹德优的说法是：“是为了把有关信息教育的学科专业组成共同体”，然而又预测图书情报、经济管理、计算机科学、电子工程和传播学等有关学科必将组建成统一的“信息科学共同体”。瓦尔利兹女士则告诉我们：“传播学者与信息科学家具有相似的基本问题，是关于信息源、中介或技术，以及寻求信息或作为信息分配目标的个人或组织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并没有说他们会成为“科学共同体”。信息研究与传播研究的关系并不是看起来那么简单。

那么传播学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呢？它与信息研究是什么样的关系？档案学与这种结合又是什么关系？这一整合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

① J. Varlejs. Communication/information/libraries: a new alliance. Jefferson, N. C.: McFarland, 1985: viii.

第一章

理论的引进与交流

第一节 背景概述

传播学对情报学来说并不陌生。即便在国内，理论的引进与交流也早已展开。用一句曾经流行的电影台词来说就是：“原来是老朋友了。”

传播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社会信息传播现象的新兴学科，他们普遍认为形成于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尽管如此，图书馆学、情报学乃至档案学仍然很早就意识到传播学与自己的特殊关系。一般认为较早引入传播学理论的是谢拉，他的信息交流说，直接与传播学的相关原理相联系。这一过程基本上与传播学的孕育与产生同步。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图书情报学研究以及稍后的档案学对于传播问题的探讨呈现日益深入、广泛的趋势。

传播学本身的历史不长，引入我国的历史更短。最早虽可追溯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郑兴东、陈仁凤的“传播方式的探讨”^[6]，或者甚至更早，但大规模正式引进始于 1982 年 5 月威尔伯·施拉姆（Willbur Schramm）对中国大陆的访问，此后开始出现大量的传播学介绍性文章，如，1983 年，人民日报出版

社出版了我国内地第一部介绍传播学的论集《传播学（简介）》；1985年，新华出版社出版了施拉姆的经典著作，书名叫《传播学概论》，对国内的传播学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几乎与传播学在我国内地引进与传播的同时，这一崭新的领域立即引起了图书馆学与情报学界一些敏锐人士的注意，例如黄纯元早在1983年就在《情报学刊》上发表了论文《传播学和情报学》。我国交流说的代表人物周文骏在其1984年完成的《文献交流引论》一书中，便明确地将传播学与图书馆学加以比较^[7]。此后，对传播学的引进随着我国传播学研究的进步而相应发展。相对来说，档案学在20世纪80年代与这个领域的关系主要发生在与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关系之中，尽管档案领域早就有使用“传播”这一术语。档案学独自与传播学发生关系应该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事了。

我们先对这一引进与理论交流过程作一个横向的梳理。内容主要涉及国内学者以及被国内引荐的学者的思考，还有少量笔者认为应当介绍的国外观点。

第二节 学科比较研究

比较研究是引进的前提。目的是对双方的研究对象、渊源、范式、特征与应用相互对比，以及对学科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找出其共性和差异，从而找到联系的切入点，乃至超越双方更本质的规律。

一、传播学与情报学

前面提到的拉特格斯大学在他们的图书情报学院与传播学院于1982年合并之后，原图书情报院校友会执行委员会决定1983年举行的座谈会的主题应反映这一问题。瓦尔利兹女

士是这次会议的组织者与会议录的编辑，上述说法来自于此后会议录^[6]的前言。她还认为双方本身都是交叉学科，都利用行为科学作为方法论，图书馆学则被称为应用情报科学（或信息科学）。双方的区别在于：传播学更关注过程，图书馆学关注内容，新闻与大众传播则关注信息（message）与传递（transmission）。“环境可能不同，但基岩（Bedrock）是一样的。”她的同事德普罗斯珀（Ernest R. Deprospro）则回忆自己的科技情报学教育传统，她认为对信息的关注主要在于管理与决策，并存在一个假定：好的信息带来好的决策，所有好的管理者都是好的决策者。因此，她是“带着玫瑰色的眼镜观照信息领域。”^①

国内学者中比较集中并成功地论述的是华东师范大学的黄纯元，他在其论文^[8]中认为两学科存在着相互依存关系：传播是思想的传播，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报交换关系，对传播与对情报的研究互为基础。首先，从学科产生来看具有共生性，都是第三次传播革命的产物。而且是这一革命给社会带来的正反伴生影响的产物，即传播正面影响导致传播学的产生；传播的“异化”，即情报爆炸带来了情报学的崛起。其次，在学科内容上两学科相互交叉、渗透、重复，他依据传播学“5W”模式，将情报学研究内容归纳为相应的五个部分：（1）情报组织机构、体制等研究（控制分析）；（2）情报分析（内容分析）；（3）情报传播渠道研究（渠道研究）；（4）情报用户研究（受传者分析）；（5）情报利用效果（效果分析）。在此他实际上将情报系统作为一种传播系统来看待。最后，在未来发展趋势上两学科

① E. R. DeProspro.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ome Important Links In: J. Varlejs. Communication/information/libraries: a new alliance. Jefferson, N. C.: McFarland, 1985; 32.